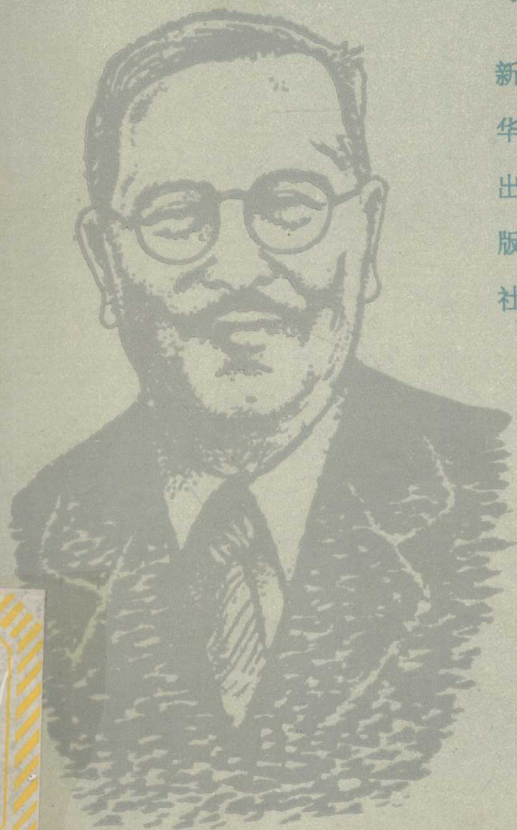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革命史小丛书

陈嘉庚

赵力田 编写

新华出版社



《中国革命史小丛书》编辑委员会

顾问：王首道 康克清

主编：苏双碧

副主编：陈君聪

编委：李捷 曹宏遂

周道荣 宋镇铃

马宝珠

责任编辑：王连娣

K201/26

中国革命史小丛书

陈嘉庚

赵力田 编写

*

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.625印张 31,000字

1990年6月第一版 1990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000册

ISBN 7—5011—0715—7/K·97 定价：0.90元

中国革命史小丛书

陈嘉庚

赵力田 编写

目 录

一、青少年时代.....	1
二、奋起发家.....	4
三、倾资兴学.....	8
四、毁家办学.....	16
五、华侨旗帜.....	21
六、回国慰劳.....	27
七、民族光辉.....	38
八、鞠躬尽瘁.....	46

一、青少年时代

公元1874年10月21日，陈嘉庚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（今厦门市集美镇）。

闽南海滨的集美社与台湾一水相望，距厦门十余里，三面环海，是个不大的半岛。岛内居民全部姓陈，主要以捕鱼和海涂养殖业为生，大多生活贫苦。清代以来，因不堪封建剥削出洋谋生的穷人渐多。中英鸦片战争后，厦门被迫成了“五口通商”的口岸之一，附近不少劳动人民被外国洋行拐骗到南洋、美洲等地当“猪仔”（苦力）。这些经过九死一生得以幸存下来的人们，又牵引同乡、同族的贫苦者前往谋生，这样，“过番”当“南洋客”，便成了劳动人民的一条生路。

陈嘉庚的曾祖父陈时赐这一辈，有兄弟5人，2人出洋3人居乡。祖父陈簪〔zān〕集，在乡“耕渔自给”，所生3子，都是“番客”（华侨），其中老三陈纓杞（又名杞柏，字如松）即陈嘉庚的父亲，少年时离开新婚妻子，只身前往新加坡谋生。到陈嘉庚出世时，他已是一个拥有一家米店的侨商了。陈嘉庚的家庭，可谓一个华侨世家。

陈嘉庚是由母亲一手抚养大的。父亲的汇款时继时辍〔chuò〕，他须帮母亲做些种地瓜、拔花生、剖牡蛎〔lì〕之类的辅助劳动。9岁时，始入集美社“南轩私塾”〔shù〕读书。塾师陈寅，是个贫穷、迂腐的老学究，授课只管照本宣科，不加解说。课本为传统的《三字经》、《四书》等。按照私塾惯

例，塾师授课一月，休息一月或半月。因而一年的课程，往往需要二、三年才能学完。陈嘉庚随陈寅读书多年，识字甚少，学业几乎空白。直到16岁，对古文和报刊文字，略有一知半解，只知有“天下”，而不知有世界各国。

陈嘉庚少年时代受私塾之误，痛感旧式教育的弊端，促使他日后下定决心办教育改变家乡面貌。

1890年，陈嘉庚因塾师陈寅去世而辍学。不久，应父函召去新加坡，开始踏上“南洋客”道路。这时的新加坡，是英国海峡殖民地的首府，居民大多是华人，在18万余人的总数中，华侨占12万余人，其中闽南人达4.5万。而陈氏华侨中，富商巨贾，社会地位显赫者已不乏其人。

陈嘉庚到新加坡后，在父亲陈杞柏所经营的“顺安”米店学商。父亲只管其他产业的业务，“顺安”由陈嘉庚的族叔经管，陈嘉庚协助族叔管理银钱货帐，兼任书记（文书）。米店的业务，是从泰国、越南和缅甸采买大米，转售于新加坡零售米店及外地商行。1892年，族叔回国，陈嘉庚任“顺安”米店经理兼管财务。陈嘉庚从集美乡村初到灯红酒绿的异国殖民地，庶母苏氏又嗜[shì]赌成癖，挥金如土，置身这样的环境，他却埋头工作，仆仆于事业。利用经手业务的机会学习文化，积累商业知识，很快熟悉了业务，把米店经营得有条有理，获利五、六千元。尽管如此，他守职勤俭，未尝妄费一文钱。

1893年，陈嘉庚奉母命回乡完婚。成家之后，他在家乡一面经营渔业，一面从塾师补习中文。在集美近两年的时间

里，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对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，将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——《马关条约》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。台湾、澎湖列岛被割让，陈嘉庚感到痛巨创深，割台使“吾闽断却左臂”。中华民族危机加剧，使陈嘉庚进一步认识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。

1895年夏，陈嘉庚第二次出洋，继续在新加坡“顺安”米店任经理。两年后母亲在家乡集美病逝，停柩[jiù]在堂，父亲以米店乏人照顾，未许奔丧。延至1898年秋族叔来新加坡后，他才得以起程回乡。由于风水先生说陈嘉庚所择墓地正穴方向不合，须待两年后才能下葬，只好暂且埋入墓穴之旁。次年春，陈嘉庚仍回“顺安”任经理。1900年冬，他如期返乡葬母，恪守孝道3年。

当陈嘉庚第四次来到新加坡时，父亲的产业已由繁盛转为衰败，正濒临破产。这时，父亲年事已高，不管营业，族叔染疾半身不遂。陈嘉庚硬着头皮接手收拾烂摊子，他采取割肉补疮等办法加以维持，总算还清贷款。最后终因无力回天，于1904年宣告破产。清算帐目，除房产外，尚负债20余万元。原来准备到新加坡继承家业大展宏图的陈嘉庚，经受住了这场打击，决心从头起家，自闯一条新路。按当时当地习惯，父亲死亡或破产，儿子不必承担债务，但陈嘉庚立志要代父还清债务。时年31岁。

二、奋起发家

1904年春，陈嘉庚开始独立自营。他首先看准了菠萝罐头业。菠萝是新加坡的特产，由菠萝加工成罐头，远销欧美各国。在新加坡经营罐头的欧美诸洋行和商号，为了保证自己的货源，经常向厂商提供制罐的原材料，付款期为40天。罐头厂工资每半月清算一次。只有购买菠萝须用现款。因而不必用多少流动资金，即可获得厚利。正因为菠萝罐头业有这样的特点，陈嘉庚便从这里开始创业。

他以7000元作资本，购置了旧机器，用茅草木料盖厂房，从简从速。一所取名“新利川”的菠萝罐头厂只用了两个月时间便建成投产，赶上了当年的菠萝旺产季节。恰好这时与父亲合伙开办的“日新公司”的经理病逝，依照英国殖民地法律，其股权应当停止，公司归陈嘉庚经营。“日新公司”也是经营菠萝罐头的，这就为陈嘉庚初显身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。

当时，新加坡已有菠萝罐头厂10余家，每年外销量约200万箱，竞争颇为激烈。欧美洋行每隔两三天按其国内电示采买罐头，行情变化无常。陈嘉庚自接管“日新公司”后，一方面暗地留心10余家同行的经营情况，发现他们对市场信息若明若暗，生产带有很大的盲目性。另一方面，他对洋行采买罐头行情进行了调查，了解到其所采买的罐头，有条庄、块庄、方庄、枚庄、刻花庄等五、六十种，其中以条、

方、枚庄为最大宗，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八九十，每次成交动辄[zhé]千箱至万箱，是同业竞争的中心。其余数十种杂庄年产仅20万箱，每次成交数不过数十至数百箱，一向不引人注意，可是杂庄价格高，每箱比普通庄多三角至七、八角。掌握以上情况后，陈嘉庚决定人弃我取，积少成多，独揽这笔“小生意”。

主意一定，他每天上午必同副手分别到各洋行询问商情，把所有杂庄定货全部承揽下来。不久，市场需要的大部分杂庄菠萝罐头，几乎都归到他一家门下。

对传统的经营方式，陈嘉庚大胆地进行了改革。同业各厂采买菠萝，历来都是按枚论价，而菠萝每枚的大小及成熟程度不尽相同，有的还有一些坏烂，议价时不计重量，全凭眼力。而且须待每季停工后才开始计算盈亏。“日新公司”过去也一直采用这种方式。而陈嘉庚采取的办法却是：规定每日购进的菠萝必须当天制完，当夜即结算盈亏，以此作为次日采购议价的标准。在生产中，要求尽量减少剖工上的损失和浪费，同时严把质量关，以建立商业信誉。他每日清早和下午必到工厂巡视，亲自指挥生产。

3个月生产下来，“日新”获净利3万元，“新利川”获利9千余元，两厂合约4万元，利润比当时最有名的大厂高出七、八倍，远居同业老厂之上。陈嘉庚自称为“初出茅庐”的第一次成功。

旗开得胜，陈嘉庚信心大增。他扩建了“新利川”厂房，增置了机器设备。为了保证两厂原料的供应，他在“新利川”

附近购买荒地500英亩，取名“福山园”，立即开荒种植菠萝。另外，还投资2万元，开设一家米店，名“谦益”。

当年冬季，虽然菠萝罐头市价略有下降，由于陈嘉庚经营有方，两厂仍获利2万余元，米店也得利8千余元。独立经营的头一年，除伙伴红利外，陈嘉庚总计获利6万元，在新加坡菠萝罐头制造业中站稳了脚跟。

第二年夏季，“日新”、“新利川”两厂再次凌驾于同业之上，获利3万余元。陈嘉庚抓紧时机，发展实业，在运输方便的地点又建了一个罐头厂，兼制冰糖。谁知到了这年冬季，菠萝罐头行市下跌，3个罐头厂仅获利1万余元，尽管不能与上年相比，但远远超过同业各厂。陈嘉庚雄心勃勃，准备趁明年“福山园”菠萝第一次出产的时机，大干一场，以期还清父亲的旧欠。

然而天竟不助人愿，1906年夏，菠萝罐头市价下跌更甚，各色杂庄罐头也大为减销。“福山园”首次出产的菠萝遭此命运，无利可图。陈嘉庚惨淡经营，总算保住盈利1万元的局面，但计划为父还债的夙愿，却无从实现了。

心愿所系的1906年受到如此挫折，实在令陈嘉庚沮丧，同时也使他清醒了头脑：单靠经营菠萝罐头发家，受制于捉摸不定的市场变化，且同业竞争激烈。只有善于抓住市场的脉搏，开辟新的领域，进行多种经营，才能大有作为。这样一想，陈嘉庚的思路顿时开阔起来，周围变幻不定的商业信息，格外引起了他的兴趣。

一日，陈嘉庚照例到各洋行探询菠萝罐头行情，偶然听

到一条有关别人成功的消息：陈齐贤把马六甲的橡胶园出售获得巨利。在此之前，这样一条与菠萝罐头业无关的消息，是不会引起陈嘉庚注意的，而现在使他怦然心动，眼光为之一亮。橡胶树本是南美洲的一种野生植物，所出生胶在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上用途很大，现在逐渐发展为人工种植，刚刚移植到马来亚、新加坡一带。陈嘉庚受陈齐贤成功的启发，判断种植橡胶定有前途。他当机立断，用1800元把陈齐贤剩下的18万粒种子全数买进，在“福山园”菠萝株间套种，两个月内种完。

大胆经营橡胶，陈嘉庚迈出了开拓新局面的第一步。接着是第二步：扩大米业经营。这是他最为熟悉的行业。他以4万元与“恒美”米店原经理合作，共同经营熟米厂。陈了解“恒美”经营加工的熟米，有治疗脚气病的功效，向为华侨所喜食，其价格每担比生米高出一元以上，所以在原股东因意见不一而退出，经理招股经营时果断入股。

1907年，34岁的陈嘉庚发家成功，事业蒸蒸日上。靠新经营的熟米厂（橡胶尚未成林）、菠萝罐头及生米厂，陈嘉庚在经济上翻了身。合办“恒美”不久，熟米价格即见上涨，经营16个月，得实利达16万余元。“谦益”所经营的生白米，亦得利1万元。3家菠萝罐头厂在当年菠萝罐头价格猛跌，许多厂家亏本甚至倒闭的情况下，经受住了考验，仍获利2万余元，其生产的“苏丹”牌菠萝罐头已成为国际市场上的名牌货。“福山园”出产的菠萝当年也获得5000元的实利。这一成功，使陈嘉庚得以实现自己的夙愿，为父亲还清了全部债

务。此举也使陈嘉庚在华侨社会中获得了很高的信誉。

陈嘉庚头脑清醒、锐意进取，在曲折中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产业。到1910年，陈嘉庚已是拥有两处橡胶园，4个菠萝罐头厂，1家米厂，1间米店，存款额达45万元的实业家，超过他父亲极盛时期的产业。以后，陈嘉庚被选为中华总商会第6届委员会协理（福建帮四协理之一），跻身华侨社会上层。

三、倾资兴学

辛亥革命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，建立民国政府，陈嘉庚倍受鼓舞，他“热诚内向，思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”。然而如何尽到自己对祖国应负的责任呢？少时深受私塾教育之害，“抱憾不少”的陈嘉庚，在新加坡就十分热心赞助华侨教育公益事业，现在决计回乡兴办学校。

1912年秋，陈嘉庚回到阔别近十年的故乡。福建的乡村教育状况令陈嘉庚触目惊心：私塾大半停歇，少年儿童上学无门。他到同安各乡考察，常见儿童成群嬉戏赌博，衣不蔽体，多有赤裸全身者。同安虽办起一所县立小学，招收学生百余名，但十余年间，竟没有一班毕业生。这是因为县长频繁更换，校长随之变更，原有教员、学生则一哄而散。故没有一班学生能学满6年的。集美社虽然还办着私塾，却各房分立，每所收男生一、二十人，女孩不得入学。

为了尽快改变家乡教育现状，免除下一代人再受其苦，

陈嘉庚决定首先创办集美小学。他积极奔走各房，劝告各房长将私塾停办，联合筹办集美小学，由自己独资负担经费。随后，他招聘校长、教员。经陈嘉庚多方努力，集美小学终于1913年春开学，共设高小1个年级、初小4个年级，学生135名。

小学借集美大祖祠堂和附近各房祠堂开办后，陈嘉庚开始规划建筑校舍。他出资2000元，购买村西一口半废的渔池，填池造地，建筑校舍和操场。第二年，造价1万4千多元的校舍落成，集美小学移入新校址上课，兴办集美小学后，陈嘉庚回新加坡继续经营实业，以期扩大进一步兴学的经济实力。

1914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。海路梗阻，军运为先，陈嘉庚经营的菠萝罐头及熟米都运不出去，被迫停止生产。入冬，船运稍松，存物才陆续售出。这一意外的情况，却使陈嘉庚看出战时航运大有可为，是兴办和维持实业的生命线。于是先租入两艘轮船，为自己运输米谷。继而又租两艘，共4艘（合7800吨级），替英国政府承运楠木片到波斯湾，并乘便抽空运载其它货物。一年之间竟获利20余万元，加上其他实业收入，获净利共达45万元。

经营海运告捷，陈嘉庚再上一层楼：于1916年和1917年先后购置两艘轮船，重点发展。在此期间，他调整实业结构，将一菠萝罐头厂改建为橡胶制造厂。把罐头厂预定的白铁片高价转售（因战争需求量大而变昂贵）。鉴于熟米厂家渐增，已无利可图，毅然将“恒美”熟米厂也改建为橡胶制造

厂。由于陈嘉庚审时度势，及时改变、调整经营重点和方向，使他获得丰厚的利润，仅1917年，年利即达90余万元之巨。

随着陈嘉庚经济实力的发展，他兴办教育的计划也逐步扩大。经营海运得手后，他即派胞弟陈敬贤回乡，筹办集美师范学校和中学。经过一年多的筹建，1918年3月，师范和中学两部同时开学，收师范生3班，中学生2班，共196人。

当时福建省的第一所师范学校在福州，陈嘉庚开办集美小学时，为选聘教员，曾亲去考察，结果大失所望，原来福州师范不过是纨绔〔wán kù〕子弟的镀金场所。为了防止在集美师范出现这种腐败的弊病，培养有志于从事乡村教育的人才，陈嘉庚决计对师范招生制度加以改革。他认为，兴办师范学校的宗旨既为普及教育与培养合格师资，学生必须具有服务教务的志愿。农村小学教师月薪仅二、三十元，定非富家膏粱子弟所愿为。而普及教育的关键在于穷乡僻壤，所以招生范围应力求普遍，以便毕业后回原地任教。陈嘉庚特地从新加坡发函通知闽南30余县劝学所长，要求每一大县代为招选贫寒学生五、六人，每小县三、四人，所选学生须有志教职，赴校复试，考核录取。他对鼓励师范生的办法作出规定：除和中学生一样免收学宿费，由校方供给被席蚊帐和统一制服外，还豁免膳费。这就为贫苦青年创造了优惠的入学条件。对于华侨学生，陈嘉庚规定由新加坡本店介绍的南洋华侨小学毕业生，概可回国升入集美中学，如到校时考试未及格者，则进入补习班学习，以示优待。从此，优待侨生

成了集美学校的原则，加强了华侨和祖国的联系。

经营海运，使陈嘉庚深感中国航权丧失的痛楚。因此他决心创办水产及航海学校，以振兴祖国航业，开发水产资源。当时全国仅有上海吴淞一所水产航海学校，经与该校联系，陈嘉庚同意先资助该校两名高才生留学日本，两年后回国任教。随即向德国购买机器，在厦门自建渔轮一艘，准备供学生出海实习之用。1920年2月，集美学校水产科正式开学（1925年春增设航海科），学生待遇与师范生相同。

陈嘉庚在家乡兴学的规模日渐扩大，逐步形成一个较完整的教育体系，到1927年，共计有幼稚师范、男小、女小、男师、男中、女中（由女师改成）、水产航海、商业、农林、国学专门10校，另有医院、图书馆、科学馆等，仍统称集美学校。学校的校训为“诚毅”，这是陈嘉庚与其弟敬贤商定的，意即：诚以为国，实事求是，大公无私；毅以处事，百折不挠，努力奋斗。

陈嘉庚除大力兴办集美学校外，对扶植闽南地方教育和南洋教育事业，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。为了提倡和改善闽南教育，陈嘉庚规定集美小学不收外乡学生，以鼓励各乡村自办小学。1919年，他发起组织“同安教育会”，对各乡30余所小学给予资助，还计划向各地华侨募捐，每年在同安创办20校，10年内普及小学教育。1921至1922年，先后创办了40余校，后因华侨捐款中断而未能实现计划。对华侨教育问题，陈嘉庚也特别重视，早在辛亥革命前一年，他就担任新加坡“道南学校”的第三届总理。1912年，他协同闽侨开办“爱同

学校”，1915年，又开办“崇福”女校。1918年，陈嘉庚联络新加坡、马六甲16所华侨中学总理开特别大会，筹办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并担任董事会总理，这所打破东南亚华侨地域、帮派界限合办的第一所华文中学，于1919年3月开学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陈嘉庚的实业发展迅速。1918年，他的两条轮船先后在地中海被德国舰艇击沉，海运由此结束。他把实业发展重点转移到橡胶业上，用轮船保险赔款购进橡胶园1000英亩，另购荒山2000英亩，开荒种植橡胶。除原有的橡胶厂外，陈嘉庚又投资50万元，与人合办3个橡胶公司，将所有的罐头厂全部让出，只保留米店。这样，陈嘉庚同时经营橡胶种植业、生胶加工业和熟胶成品制造业，集橡胶方面农、工、商三业于自己公司之下，成为原料供应、工业生产和对外销售一条龙的一家新型大企业，独树一帜。

实业的迅速发展，需要大批专门人才。而中国当时社会的政治腐败、经济落后、国耻累累。如欲发愤图强，一洗国耻，振兴教育是唯一有效的良方。他在创办集美学校的过程中，多次遇到校长难找，教员难聘的困难，深感大学地位的重要。他把大学在教育中的地位比作机器中的发动机，而中小学和中等专门学校只是它的附属品。为了实现自己救国救乡的心愿，陈嘉庚决心“不惜牺牲金钱，竭殫[dan]心力而为之”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，他认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已经到来，决计亲自回国筹办厦门大学 and 扩充集美学校。

1919年5月，陈嘉庚第五次回国。行前，他把自已在新

加坡的不动产橡胶园7000英亩和货栈、店屋地皮面积150平方英尺，捐作集美学校永远基金。并宣布：“此后本人生意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，除花红以外，或留一部份添入资本，其余所剩之额，虽至数百万元，亦决尽数寄归祖国，以充教育费用”。

陈嘉庚这次回到祖国，感受到“五四”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光明和希望。“民主和科学”的口号，也给他办学活动以巨大的推动力。他亲自撰写《筹办福建厦门大学和附设高等师范学校通告》，阐明倡办厦大的动机和目的：

“专制之积弊未除，共和之建设未备，国民之教育未通，地方之实业未兴，此四者欲望其各臻完善，非有高等教育专门知识，不足以踏[门]等而达。鄙人久客南洋，志怀祖国，希图报效，已非一日，不揣冒昧，拟倡办大学校并附设高等师范于厦门。”

7月13日，陈嘉庚邀集地方人士在厦门浮屿开特别大会，发表长篇演讲，进一步说明筹办厦门大学的动机和打算：“窃吾人欲竞存于世界而求免天演之淘汰，非兴教育与实业不为功。此固尽人所知，然就进化之程序言之，则必先兴教育，而后实业有可措手”。谈到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时，他说：我国现有大学，多属外国人办的，其内容不过神学、文学、医学等科目，而农工商等关系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生存的重要专业，则少有所闻。他准备创办的大学，力求完备，为国家培养教育、经济和政治的专门人才，因此必

须年筹几十万或百万元的经费，或千万元基金，但自己“棉力有限，唯具无限诚意”，希望海内外同胞同舟共济，见义勇为。最后他说：“今日国势危如垒卵，所赖以维系者，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。若并此而无之，是置国家于度外而自取灭亡！”陈嘉庚在会上当场认捐厦门大学开办费100万元，当年交清；常年费300万元（每年25万元，分12年交清）。而这时陈嘉庚所积存的资产一共不过400万元！

陈嘉庚的演讲，引起强烈的反响。黄炎培曾问某闽商：“你们听了这演说作何感想？”回答是：“如果不惟陈君是助，就不是人！”

陈嘉庚亲自勘察选定校址，并积极物色校长和教师。1920年1月，汪精卫到漳州找陈炯明，陈嘉庚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时期与汪结识，便邀请汪精卫来集美参观，向他介绍筹办厦门大学的计划，并聘汪为厦门大学校长。但不久汪精卫因粤军回粤成功，便以政务繁忙未暇兼顾而辞职。于是，陈嘉庚另组厦门大学筹委会，聘蔡元培、郭秉文、黄炎培、邓萃英等人为筹备委员。10月，陈嘉庚前往上海邀集筹备委员开会，举邓萃英为校长。

厦门大学开办之初，设师范（文、理科）商学两部，本科4年，预科2年。1921年3月1日，在厦门及南洋各埠招收新生96名。4月6日，厦大借集美中学新校舍开学，校训为：“自强不息”。陈嘉庚选定5月9日（“国耻纪念日”——袁世凯秘密承认日本灭亡中国的21条），为厦大校舍建筑奠基。

陈嘉庚设想的厦门大学，规模宏大，可容纳学生三、四